

劉賓雁和他的時代

陳榮銓

劉賓雁十九歲加入共產黨，賣力工作。因一篇文章對現實黑暗面批評，被判為「右派份子」，關入「五七幹校」勞改，成為「賤民」，痛苦地受社會排斥達二十餘年；他的經歷，透露了大陸一代知識份子的苦難！

一、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

劉賓雁生長在一個鐵路局職員的家庭裏，他的父親是中東鐵路的翻譯員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以出外掙錢勞動者身份到蘇聯謀生，渡過了七年之後於一九二一年回國。（註1）而劉賓雁是在一九二五年出生於哈爾濱，因為是長男，倍受他父親的溺愛。有一傳說，說他是混著有俄羅斯人的血，但是他個人却否認，說：「母親是中國人，如果說有混血的話，那也只是漢族和滿族之間的混血，與外國混血是談不上關係的。」他小的時候，受到他父親直接的影響很深，那便是政治因素。因他的父親對蘇聯抱著很強烈的感情。那是他的父親和祖父從山東跑到黑龍江時，老家的沂蒙地區（註2）仍然是很落後貧窮地區，以前從這個地方漂泊到東北去的人最多。多半是在碼頭供人跑腿或當人力車夫，生活非常的窮苦。恰在那時，蘇聯共產黨被叫做貧窮黨，所以他的父親非常同情共產黨，腦海中老是想著「惟有沒有貧富差別的社會，才是最理想的社會」（註3），因此劉賓雁小時候，即被他父親灌輸此種思想。

又，從他父親處承受到喜歡讀書的影響。因為他的父親很早就輟學，之後均憑個人發奮自學。像從蘇聯回國，即教人學習俄語，其所要的報酬，就是要那人教他說中國話及讀中國書，不久也學會了寫信。是一個很勤勉的讀書人。並常說『聊齋誌異』等故事給劉賓雁聽。

一九三三年，日本強制收取使用中東鐵路，並極力排斥蘇聯的影響，因此導致他的父親失業。全家的生活遂陷入極端不安定之中，連僅有的一點點積蓄也見底，這種環境對劉賓雁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一九三一年，日本即佔據了東北，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（蘆溝橋事件）時，劉賓雁剛好十二歲。當時的劉賓雁有著兩種很強烈的思想。一是『民族感情』，那時東北的人的腦海裏都深印上「亡國論」的思想，但誰都不願當「亡國奴」，內心都希望著將日本打敗，可是抱著「自信」的人却非常的少。而日

本人却每天都在城市街上貼出「同盟通信社」（註：4）的宣傳海報。像日本皇軍將日軍旗插在城牆上歡呼的照片。好像在告知，日本又攻陷佔領了一個城市。站在這些宣傳海報前，劉賓雁那顆年青的心被刺傷了，有時候忍不住悲從中來，掉下了傷心的眼淚。

另一是對文化的渴望。哈爾濱是一個很美的城市，受到俄國的影響很深，在東北來說是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比較進步的文化都市，因此各種文藝雜誌和書籍也很多，也因而產生了一群左傾的文化人。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作家有十幾名都是東北出身的。像蕭軍、蕭紅和「國際」的翻譯詩的塞克等都是，但，以後他們都到上海去了，然而其影響力和作品却都留在哈爾濱。「七七事變」發生，對日抗戰開始後，在哈爾濱都可以讀到魯迅、巴金、丁玲、郭沫若、老舍等人的著作。

那個時候的文學往往成爲政治與革命的橋樑。因此日本佔領了十數年後的一九四〇年代的哈爾濱，仍然殘留著共產黨的勢力。至少在一九四二年時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依舊是相當活躍的。而劉賓雁是從十四歲時，透過讀書會與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接近的（註：5）。故其思想成長和當時的客觀情況有關。主要是，當時從山東省、河北省漂泊到東北的移民和美國的開拓人民有類似的地方。因移民們掙扎著到達東北無邊無際的荒原時，同時的也從中國的傳統家長制度社會的羈絆中脫出，切斷了原有關係變成獨立的人。在這種廣漠大地裏，個人只

要有勤勉、努力和勇敢的因素，即能決定其個人是否能成長。在這種環境的促使之下，人們都持有著開天闢地的進取精神，那種思想是很自由而不受束縛的。

劉賓雁幼時所受的教育，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育方式，他父親從不干涉其讀書和說話。恰巧劉賓雁很喜歡讀書，沒錢買書時，就向朋友借，或者跑到出租書店去租。因此劉賓雁對文學的興趣，馬上轉移到政治方面去。民族的受壓抑和家庭的沒落，很快的將劉賓雁的思想轉移到社會的不平等和不正義的方面去。由於繳不起學費而輟學的事，引起劉賓雁對社會問題的關心。最初，劉賓雁是希望做個作家，然後當個新聞記者。從那時起他開始學會讀日本書，從很多的日本出版物，增加了他對國際知識的理解。他開始閱讀馬克斯的著作，也是日文譯本，因當時中文書，往往無法到手。

一九四〇年，劉賓雁在他姊姊的援助下，到北平的中學讀了一年書，之後，在輔仁大學附屬高中讀了半年退學，因他的姊姊無法負擔他的學費。而他的正式學業也就到此終止。就於一九四三年在天津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抗日組織。這個組織名叫「抗日救國聯合會」簡稱「抗聯」（註：6）。

一九四四年劉賓雁加入共產黨。他的工作是在小學或中學教書，偶而在銀行工作。開始時教讀一些「進步性」的文學書籍，像蘇聯作家「Turgenev」（一九一八年—一九八三年）的書，藉以提高年輕人的激奮情緒。然後從

政治上的共鳴度，認爲已接近共產黨理想的程度時，就進一步抓住這些年輕人，讓他們諷刺性的書。裏面有毛澤東的「論聯合政府」的鋼版印刷和掩飾的活版印刷書類。在天津，除了以上的活動以外，更冒險刻鋼版印刷毛澤東的著作，並進一步分發傳單及到處張貼。同時，更分發日文傳單，到日本人的家庭裏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，劉賓雁在天津的耀華中學教書，這是一間保守的學校，他是一位學生（共產黨員）從事爲共產黨宣傳，並極力改變學校的作法，煽惑學生從事政治活動，故在昆明所發生的十二月一日事件的抗議支援遊行時，這個中學的學生參加的人數最多。後因年齡冒稱廿六歲事揭發，在校長勸慰下於一九四六年七月離開天津，逃回東北。當他逃回東北哈爾濱不久，國共戰爭爆發，松花江被封鎖。他在蔣南翔指示之下，留在哈爾濱憑藉他在當地的影響力，並以教師身份做掩護展開爲共產黨宣傳。但學生之間視國民黨爲正統的觀念很強，而對共產黨都覺得很礙眼，沒有信用。爲此他便留在哈爾濱一方面做教員，一方面接受共青團的工作，開始爲共產黨賣力工作。

一九五一年，劉賓雁就到北平「中國青年報」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報）工作，這之前他在哈爾濱策劃東北民主青年聯盟的組織工作，當聯盟的副主席和中學的教務主任。並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他和大隊人員到瀋陽負責接收工作，並留在瀋陽繼續他的共青團的活動。一九四九年，他初次出國，經蘇聯到匈牙利

利參加世界青年學生和平友好紀念日，之後又去了蘇聯四、五次，並到過瑞士、波蘭，這些國際活動增廣了他的視野。

他在「中國青年報」的工作是當工商業部主任。（註：7）在一九五〇年代初，由於他的「關於新聞工作」的一部份的主張，曾遭受某些人的批判。他認為「老是由上面像小使一樣的流到下面是不充分的」，「新聞的機能如果只是像揚聲器一樣是不行的」主張在篇幅上多展開一些批判。結果，此一主張却成爲一九五五年時的他的罪狀。（註：8）

劉賓雁遭受批判，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天的「肅反運動」。有人仿冒劉賓雁的筆跡，匿名寫信罵胡耀邦和周恩來無能，「青年報」的總編輯也無能，應該換劉賓雁來做才對。模仿得很像，只有劉賓雁本人可以看出不是他自己的筆跡，否則，任誰來看都會認定是他寫的。於是，就開始對劉賓雁展開了非公開的審查。後來經過蘇聯的筆跡鑑定專家的鑑定，才證明不是劉賓雁所寫的。經搜查的結果發現，並逮捕了一位於九月才當編輯的女性編輯。但對他的審查也費時三個月之久，在審查過程中，他以前所發表的文章被認爲是反共產黨。他主張新聞應多刊載一些「批判」，以及他後來發表的『在橋樑工地上』（註：9）一文的原稿也包含在內。

在此稍微提一下他對文學寫作的動機：當審查結果無事之後，他也安心的到三門峽水壩工地現場和甘肅、河南去採訪新聞。在蘭州黃

河大橋工地現場參觀時，恰好找到了正合他想寫的題材，那是他數年來熱切盼望著的構想。而『在橋樑工地上』一文正是他很久以前就想寫的，其理由是他認爲「中國應當早就進步了，但是在指導層裡面，仍有滿於現狀，不求進步的所謂保守份子。」所以，他認爲大眾的智慧和才能不能充分的發揮出來。因而當工地現場的共青團書記，對他說起某些事蹟時，正中了他所謂的『主題先行』的構想。於是他回到北平後，即利用春節的休息時間，花了三個通宵完成了這篇『在橋樑工地上』一文。

但是，不幸得很，那時的中國大陸，自『五四運動』以來，就已經斷絕了對中國新文學的優越傳統。作家所必需具備的獨立觀察和思索的三條件已不再需要了。作品裡有沒有作家本身的思想也變成無所謂的。因此，這數十年來大陸的作家們事實上都宣稱：「我只是將故事彙集整理起來而已。」

不過在一九七九年以來，中國文壇發生了變化，不單只是作家的創作題材擴大了，作家們除了描述存在於生活中的消極現象，甚至於呼籲人們與此消極現象爭鬥的作家也出現了。像高曉聲、張弦等作家們的作品裏，有他們自己的很新鮮的思想。又像李准的『芒果』和『王結實的故事』也實在寫得很巧妙。

話又說回來，他那篇『在橋樑工地上』（之後被批判爲毒草）發表時，他正好在外國。但卻引起了秦兆陽（當時「人民文學」的編輯主任）的注意，並特別寫了『編輯者的話』說

：「這篇作品之沒有基本方針，實際上是熱烈的肯定社會主義制度，但，也是解放後首篇具強烈批判色彩的作品，大家應加以注意。」

他從波蘭回到大陸。下飛機後馬上聽到有關這篇文章很受歡迎之辭，甚至在當時的高級幹部裡，也博得了很好的風評，並鼓勵他要多多寫文章。

二、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

既然獲得如此好風評的作品，何以會成爲『毒草』呢？

一九五七年悲劇的起因，他說了一句：「一言難盡」。因爲從大陸淪陷起，不，自共產政權成立前就已開始了的問題，在大陸現代史上是不勝枚舉的。像「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事件」啦、「東北文藝報事件」啦、「武訓傳」啦、「紅樓夢事件」啦，比比皆是，而這些都是發生在一九五七年之前的事件，而其之所以發生，劉賓雁說：「問題的癥結不在某個人或少數人『主觀的動機』問題。而是當時流行著某種觀念和實踐在作祟。那就是馬克斯共產主義的精髓——亦即是『唯物辯證法』的批判精神。認爲站在這種觀念上，即可產生邏輯理論。假如多描述生活的光明一面，則必受積極的鼓勵，但相反的结果如果多描繪黑暗的問題時，勢必產生消極的效果，即：何以不寫美好的情勢，爲什麼儘都在描繪黑暗的一面？」（註10）而要遭到批判。

當一九五六年七、八月他發表了『本報內

部消息」時，王蒙也在九月發表了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」等兩篇，發表不久，情況發生了變化，即十月下旬發生了「匈牙利抗暴事件」。波蘭和匈牙利的緊張情勢，影響了中國大陸情勢，氣氛在急遽變化之下，那篇「在橋樑工地上」一文，雖被承認為健全的文章，但他的「本報內部消息」（註11）一文和王蒙的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」（註12）一文，却被指摘為暴露得太過份了。因此，當時有人批判王蒙，而他為了替王蒙辯護遂在「文藝學習」雜誌（註13）（1957年一月號）發表了「道是有情呢？亦是無情呢？」一文，其大意是「這種作品對一部份的幹部看來很嚴厲，但實際上是給予他們很重要的思考，希望他們能好好的工作。」

沒想到，在這個月，「中國青年報」召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。討論關於「劉賓雁和王蒙的作品」。在座談會開始前，每人分發了一份王實味的「野百合花」一文。而王蒙因在北平市的共青團地區委員會工作沒有參加，可是劉賓雁參加了。因是一個討論會，而不是批判會，所以起先不覺得怎麼樣，但當一個個發給「野百合花」一文時，他說：「就像無形壓力和王實味的作品一樣的道理。」這個時候，他才領悟到一個道理即「反右派運動是歷史上的必然性。」因當時正值毛澤東提倡「雙百方針」——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的有關講話被發表著，但下面的組織却已經自發的將他和王蒙比做同類。連印刷、分發「野百合花」一文在

內，雖非共青團中央高級指導者的意見，但却有一、二位熱心的中堅幹部因和他們二人的作品所表現的思想，不能相容。再加上「延安文藝整風」以來對文藝界的批判完全採取否定的態度。像王實味啦、丁玲的「三八節有感」啦、華君武的漫畫啦皆是。祇要稍帶有批判、諷刺的意義都視為反黨、反革命份子。這時的批判也和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時的原因一樣，那就是他們的作品有著批判性的理由。

座談會完了之後，他接到命令到上海去探訪永大紡織工廠工人罷工新聞。這個工廠由公私合營不到一年，根據共產黨所派遣的國家代表工人之言是，由於工人所提出的福利要求不被理睬，而引起了工人的憤怒，整個工廠全面進入罷工中，且將政府派遣的代表監禁起來，做為人質。

在編輯會議裡，張黎群總編輯傳達劉少奇的指示說：「『人民日報』和『青年報』應該將此一事件公開加以報導。」他聽到這個指示感覺到非常的意外。他說：「儘管我去了波蘭，事件發生時不在，但像這樣共產黨的新聞，在自己指導地區所發生的反對『黨幹部』的罷工事件，要加以報導，令我不禁吃了一驚，感到非常的興奮。」又說：「我剛從東北取材回來，什麼地方也不想去，但在接到這個任務時，就和上海出身的記者陳伯鴻一起，匆匆的搭機飛去。正好是全國正在大鳴大放，達到最高潮的時候，因此我內心感到非常興奮。」他說：「那是一個想起來很令人懷念的春天。」

他就住在陳伯鴻的家裏，陳的太太范瑞娟是有名的越劇明星。每天二人一齊到永大紡織工廠去探訪罷工的消息。他在上海時雖沒有參加上海的鳴放運動，但却很關心，就請兩位對鳴放內情較詳細的記者說明，並以他們提供的上海文藝界的情況資料為底，寫了一千多字的消息，標題以「沈思的上海」，並打電報到北平去。那時，北平的氣氛已變，但他仍不知情，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的「青年報」以三面頭條新聞，刊載他的消息，雖僅是一千多字簡短的消息，但却決定了他的命運。其內容是：「這二、三天上海煙雨濛濛，但『新民晚報』（註14）（新民晚報當時是很活躍的報紙）却像飛一般的賣光。很多的上海市民現在正思索著什麼問題……」並介紹了上海文藝界所提起的兩、三個問題。例如：上海在一九三〇年代產生了很多的作家和作品，為什麼解放以後竟然斷絕沒有一個呢？像這種問題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仍然存在著，而這種問題却關係到黨的文藝指導問題。因而激怒了柯慶施（當時的上海「市長」）也說不定。雖然他並沒有指名柯慶施，但是他在文裏批判說「上海市黨常務委員會，對中央鳴放方針的號召，採取了拒絕的態度。」並寫他們「非常沒有變化」，更寫著「市委員會的幹部開會時都像被割掉舌頭似的，哭喪著臉，不知道在想什麼？其他的出席者沒有發言的心情。」而他之所以使用「哭喪著臉」這一詞跟姚文元有關。

那時，因姚文元剛從共青團的地區委員會

轉入上海市委員會，和柯慶施同為張春橋的部下。姚文元是文藝評論員出身，反右派鬥爭前寫文章支持鳴放運動，但其思想並不一定是『真』左派，然而却是很會『見風使船』，因此被稱為是『無產階級的黃金棒』，即專門打擊別人，從中得到利益，不知道顧忌。

而他在章靳以（註15.）的介紹下和姚文元見面。章認為姚文元已抓住內部的情報，知道反右派鬥爭的計劃，因此要劉賓雁和姚文元見面。在上海的文藝會客室，章替劉和姚引見後就先回去了。他們兩人叫了一盤菓子和兩杯咖啡坐了很久。只是面對面互相都沒有句話，而劉賓雁只是想知道有關上海的鳴放情況，但不管劉問什麼，姚都拒絕回答，而且表情像石頭一般的硬，給予劉很壞的印象。實際上，姚文元已經看透對方，對劉賓雁抱著很強烈的警戒心，只是劉不知道而不煩而已。在『沈思的上海』記事以外包括劉在上海的發言和文章，都已被列為罪狀，其中包括給毛澤東的長信。那是一封『竭盡忠誠的信』（註16.），表明支持毛在講話裡推出的方針。本想在反右派鬥爭中，希望藉此能對自己的黑白有所幫忙，沒想到適得其反，成為劉的罪狀的證據。

他在上海停留了一個月，於六月初回到北平，不久即被捲入『反右派鬥爭』裏。儘管他很坦誠的、自主的將自己所有的狀況供述出來，但是却得不到信任。在文革時案件的最終決定下來為止，常常延長好幾次。故他的『右派』判決的正式發表是七月，事實上五、六月中就

已內定了，而在七月初正式被宣佈為黨內的第一次右派份子的一個，在新聞、雜誌裏被指名批判。大的批判大會有三，其他都是小規模的批判。在劉賓雁自己來說，想都沒想到會被指為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』，也並不阻止他自己一個，當初很多人都相信他不會是右派份子，但最後也都隨著大勢所趨的方向變化，連他本人都無法稍有一點的心理準備，實在是來得太突然，太可怕了。當初北平的『人民大學』教授葛佩琦曾說過：『共產黨員該殺』（註17.）因而對當時的『反右派鬥爭』來說遂陷入被殺氣所包圍的氣氛下展開，且株連著數十萬人的生命，如今回顧起來餘悸猶存。

在反右派鬥爭以後，劉賓雁所有的一切都被否定了。即他的革命歷史、能力、地位、對黨的功績：等都不被承認了。當時的右派份子分為六種類：前三種是極右，其中第一種、第二種是革除公職，自己謀生，或者送到農場勞動改造。而他是被判為極右的第三種，即所謂『留用察看』（註18.），雖仍被承認為『國家公務員』，但却剝奪黨籍，沒有薪水，每月只發二十元人民幣的生活費。他是屬於高級幹部的最低級十三級（註19.），而他的太太朱洪是屬於十七級的幹部，月薪九十九元，故當薪水被切斷時，只有由他的太太負擔，但他又抽煙，後來雖又增加了五元，但要養活一家實在很困難，這種生活一直到一九六二年（註：而共青團、中央、關係的右派份子，都被戴上帽子，而能恢復名譽留下的包括他僅三人而已）。

那時的經濟狀況非常的壞，連買書的錢都沒有，雖被恢復名譽得到十九級幹部的待遇，但每月僅有七十八元人民幣是以前的一半。由於他被判為右派份子，故他的姊姊也被指摘為右派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加上中國大陸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連續三年遭受未曾有的自然大災害，陷入食糧不足的痛苦深淵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仍殘存著糧食不足的后遺症。而他的姊姊在農村餓著肚子，為了買山芋種子來種以充飢及維生，緊急需要八十元，沒有話明年連吃的東西都沒有，雖說八十元是大錢，但再怎麼苦也只有寄去，偏偏禍不單行，他把一個月份的食糧、油、肉、砂糖、菓子的配給券全部遺失了，一家遂陷於困境之中。但總算辛辛苦苦的克服了。

而他雖被保留工作，但實際上却什麼也不准他做。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的三年，他都是在農村勞動，那時的幹部們都要輪流『下放勞動』，但也僅是一年而已，而他却一下放就三年，那時的他僅三十剛過，他的太太還是二十年代的，兩個人都還年輕，因此這三年對他來說是既長且苦的三年。但是，很幸運的，在他被下放時局勢稍微緩和，每年春節都被允許返鄉與家人度團圓夜，但不能與人見面，因他的問題被認為是重大問題，就像 Hansers 癩痢病的患者一樣被從社會隔離，返回自己家的舒適之感全無。這種黑暗的日子，在他來說却仍存著幻想。即在一九五八年時他仍存著儘管再度入黨是不可能，但仍可以寫些有價值的

東西發表。然而一九六二年的第八次十中全會裡『階級鬥爭』被強調時，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。

像：南京的青年作家方之（一九七九年的第四次文藝工作者全國代表大會將召開之前，不幸病逝。如果仍活著的話將與高曉聲齊名，是一位俱有優秀才能和人格的作家）也被戴上右派的高帽，且在一九六二年的『中國青年報』文藝欄裡刊載了他的短篇小說『下山』，是一篇傑出的作品。但是之後却說：「總而言之，被打為右派份子的作家，儘管高帽被除去，但他們的作品是不允許發表的。」又像：王蒙於一九六二年也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，但刊載這兩篇文章的雜誌也一起被批判。而劉賓雁是被認為比前二人惡名更高更徹底的壞蛋。只有自己把心閉鎖起來，自己把自己與人世間隔離起來，縱然看到朋友也老遠的迴避開，深恐惹到麻煩株連到朋友（註20）。

一九六一年末「中央」雖打出了應起用右派的政策，但劉賓雁從農村回到報社是托他太太朱洪的福，因朱洪當時是『少年報』的中堅份子，才得以回到『中國青年報』管理外國語的資料，翻譯暴露美國黑暗一面的文章。

在這二十多年間被社會排斥的生活裏，劉賓雁感覺到被打為『右派』以後，有兩個很大的痛苦：一是『我是賤民』。沒有平等的權利的人。任何人都可辱罵他。他的『高帽』好不容易在一九六六年的三月才被消除掉，但『五·一六』通知（註21）宣告文革開始，他又

被發回『右派』，並再度的被戴上『高帽』，接受『隔離審判』（註22）。重新對其身份加以『階級隊伍的整頓』（註23）。並宣佈對其『無產階級獨裁』（註24）將他下獄。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為止的四年之間，不准回家，並被禁止與家人通話。又被送到『五·七幹校』（註25），雖讓他和太太、兒子見面，却不准他們見面。在北平求學的女兒來探望時，為蘇聯修正主義的間諜，被視為通敵者（註26）。因當時，天津的南開大學造反派非常熱心於揭發通敵者。又，在一九四六年他曾慌慌張張的什麼也沒有帶的離開天津，故被認為是遭國民黨所逮捕。

右派的『高帽』取消後，成為『摘掉高帽的右派』。任人攻擊，現在仍有人叫他們為『賤生右派』。劉賓雁說：「在這種精神痛苦中最恐怖的，便是潛在意識裏不停的想『我是右派，我是右派』，如此不知不覺間就像一塊石頭常常壓在心上一般的有一種壓迫感。」另一個痛苦是，想做一件事都不可能。例如：看到一個孩子在剝樹皮時，注意這孩子說：「剝了皮樹木會死，是不可以的。」這孩子的父親一來就反駁說：「你有權利來教導孩子嗎？你是什麼身份？」有時孩子會辱罵說：「老右派的習氣！你可以教導人嗎？」實在是什麼都不能做。文革開始時，他才四十一歲的確是還年輕，但試問能做什麼？譬如說，來寫『戰爭與和平』吧！但誰都不給予發表的地方。

一個人活在世上，任誰都希望能做些自己所想要做的事吧！

在「幹部學校」的最後幾年，勞動也漸漸的減少，大部份的人都被釋放回去，只剩劉賓雁和幾個非常有問題的人被留下來。因太無聊的關係，有的跑去抓青蛙，但他却反而不能鬆弛一下精神，碰到沉悶的時候，就馬上著手翻譯。因他手上有二十萬字以上的日文的蘇聯史，雖沒有出版的指望，但他還是把它譯完，除此以外什麼也不能做。「幹部學校」就是如此的情況，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為止。

『四人幫』雖被打倒，劉賓雁却仍找不到工作，儘管他的朋友很熱誠的幫忙找，而事實上很多地方需要他這種會兩國語言的人才，但一聽到『劉賓雁』三個字，卻什麼都成泡影了。最後，他自己到商務印書館去找不要報酬的工作，去當日文、俄文更兼英文翻譯的校對。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好不容易才在哲學研究所找到工作，因為研究所所發行的雜誌「哲學譯叢」，需要翻譯員的關係。至於他的右派問題，起先他不敢抱持希望，縱然在『四人幫』下台半年以上的一九七七年，上海的某文化人仍用筆名如此這般的寫「右派份子劉賓雁」等等。歷史的確是很有趣呀！像在一九五七年所寫的文章，都是在對他批判。十年後的一九六七年姚文元在「評反革命二面派的周揚」（註27）一文裡却寫著周揚怎麼對「右派份子劉賓雁」好，但，再過十年的一九七七年的一篇題名「批判反革命二面派姚文元」一文裡，却又

寫著姚文元和「右派份子劉賓雁」有著很好的關係，真是滑稽、荒唐到極點。這樣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他的所謂「右派問題」才解決。也由於這種痛苦的程序，才使得他成爲真正的中國人即變成勤勉人民的一份子。因爲如沒有這反右派鬥爭的話，他是一位高級幹部，生活在上流階級裡，物質的、政治的享受得天獨厚，同時恰正在這個時候人民的生活起了變化，即一九五八年以後人民和幹部的質量差別越發擴大，假如他過的仍是以前的生活，則勢必和一部份的人一樣愚鈍、老化，而沈溺於豐碩的酒肉滿足之中，變成逃避現實社會的人。由於被打入右派份子的關係，他一下子轉落到最低下的社會裏，在農村裏如想吃肉或麵粉，也只有等農民將這些東西弄到手，才可以分到一點，否則，是吃不到的啊！

三、一九七九年以後

像他這樣集各種痛苦於一身，的確是很讓人意氣消沉，由於失去精神力量的支撐，導致失掉求生欲望的人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爲數很多。最可怕的就是過去的種種被吊起來施以暴行等的復甦。

在他的作品雖有些確是對當時社會，及現實情況加以批判，但並不能說是「不善良的人」。例如：「一個人和他的影子」一文裡，他描述一個右派份子的學生，是一個卓越的人物，曾建設了很多的工廠，令人打從心底佩服。像類似此種作品在一九八〇年以後更加急遽增

多。當然他暴露當時社會黑暗的一面相當的多，那是因他認爲寫事物的正反兩面之後，真實才會孕育而生。而新聞和文學是讓人民認識現實環境及社會。至於「三信危機」（註28）那是對於出現於社會的一定的消極現象無法解釋所引起的。中國大陸的狀況非常的複雜，不能僅看表面的一層。

像一九七九年時的中國問題，不單只是「四人幫」的問題而已，還包括了共產黨本身所犯的過錯，及所造成的結果是如何的深刻！以及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中共毛澤東君臨中國的「歷史課題」（註29）是如何的迂迴曲折呀！

劉賓雁好不容易才於一九七九年在「中國青年報」復職，從事他得意的新聞採訪。當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「人民日報」刊登了黑龍江省的大貪污事件後，他馬上就出發到出問題的「賓縣」去，實地取材報導事情的真相，彙編成一長篇讀物：「人妖之間」（註30），詳細敘述事件的實情，尖銳的指摘中共的社會、制度、幹部的弊害，非常引人注目，幸好當時中共黨本身也很重視官僚的經濟犯罪，因而只是被批判說：「特別責難社會主義的制度」而已，而沒有被處罰。隨著時間的流逝，中國大陸已進入一九八〇年代，但毛澤東的陰影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消逝，而完全的從中國的神州大陸上消失掉。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和三月，中共「中央」先後下達七號文件和九號文件，命令批判「鼓吹錯誤思潮的作品」和「必須無條件的保持和中央政治上的一致，違反中央的路

線、方針、政策的言論，不能讓其發展」等。於是一九八一年四月終於由解放軍報帶頭公開批判白樺的「苦戀」，接著人民日報、北京日報、上海解放日報及代表中共「中央」的「紅旗」雜誌也加入對白樺展開全面性的總攻擊，白樺被逼不得不對自己展開「自我批判」。十月鄧小平更命令在文藝報上發表刊載批判「苦戀」的文章，最後「人民日報」依其命令而加以轉載。

之後，他終於打破了自一九六三年以來的沉默，發表了很多的文藝作品，其中包括一九八五年三月開拓的創刊號刊登的「第二種忠誠」（這篇文章在海外發表之後，在香港興起了一陣「劉賓雁熱」許多報紙的專欄乃至電台的文化節目，都在談論劉賓雁和他的「第二種忠誠」）。倪育賢且在《第二種忠誠》座談會裏說：「我認爲，劉賓雁的『第二種忠誠』有三個突破：一是突破了官方對毛澤東的評價；二是突破了雷鋒的愚忠偶像；三是突破了對共產黨外交政策不能批評的限制。」並說：「此文在大陸引起了深刻的震盪。」同時一九八五年九月份香港報刊報導了劉賓雁因寫作「第二種忠誠」而遭到打擊（註31），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紛紛發表文章評論。同時工會系統的雜誌開拓創刊號發表後，引起全國總工會領導班子的震怒，僅僅出了兩期即在五、六月間等不到他的續篇寫出來「就宣告無疾而終」。西安一家發行量達一百萬份的《散文報》在全文轉載「第二種忠誠」之後，「也被地方當局借故扼殺

」了。

他的這篇以真人真事作題材的報告文學，既然一直都觸怒他所報導的不公平現象的各地當權者，遂使他遭受到「中央」領導人批評為「專門製造不安定因素」了（註32）。故他原來應西德政府的邀請，於五月二十日要啓程訪問德國一個月，也在動身前三天被中共取消了。

據了解，他不能為各地當權者及某些「中央領導同志」諒解的地方，是他既是記者，又是作家。以記者的名義去採訪，却没有照《關於黨的新聞工作》的要求去做黨的喉舌，以百分之八十的文字去寫「光明面」；相反的却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去描繪採訪所得的「黑暗面」，而且不斷的向深處挖掘，掘出許多他認為值得深思却使當權者極為可憎的問題。因此，中共黨「中央」確實有過要他不要當記者，去當專業作家之說。但是，他一直認為，他自己首先是一名記者，然後才是作家。據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出版的英文《亞洲週刊》報導，他在九月底電話回答該刊記者訪問時說：「我非常喜歡這工作。」而不打算離開人民日報。故上級暗示他不要再「製造不安定因素」，否則將安排他離開中國大陸——不是短期出國，而是帶有「放逐」的含意。

除了來自上面的壓力之外，還有來自下面的壓力，即每天有無數的人、成麻袋的信向他申訴當事人所遭到的不公平對待，要他把這些冤情寫出來。因此一位到香港訪問的作家認為，他這樣做是徒勞的。十億多人的國家，那麼

多的問題，法制又不健全，怎麼可以憑他一個人去解決？再說，所謂「猛龍不及地頭蛇」，當他去某地了解時，是一種情況，待他寫出文章時，引起「中央」重視，派人去調查時，地方上已做了手脚，變成另一種情況了。如此一來，他永遠變成「製造不安定因素」的人，既是上級的壓力，又窮於應付受苦難同胞，他只有放棄不寫報告文學。故在前面所提到的同一期《亞洲週刊》裏，他回答記者時表示，以身體不好及沒有時間閱讀的關係，他沒有打算再寫這類的報告文學，「至少一年的期間」。由於他這項決定，並告知外界，他才得出席十月十四日的北平招待蘇聯作家代表團的招待會。他的自由、安全、待遇（包括政治待遇）看來才得保持。上級的壓力，對他的批評似乎減少了。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「至少一年不寫」（註33）的報償吧！

他的「第二種忠誠」推出後，由於揭露了上海海運學院的種種黑幕，引起大陸極大的爭議，接著又於一九八六年十月號的《報告文學》推出了「第二種忠誠」的續篇「未完成的埋葬」，更是全以海院為背景。點名該學院五名黨委中的三名後，與該學院更結下了不解之緣。故當一九八六年後半由於各地大學生的要求民主示威遊行，要脅到中國大陸的安定，因此黨內的保守派及鄧小平，批判指責是胡耀邦沒有自信改革所引起，胡也因而引咎辭職。並剝奪批判共產黨的文藝作家王若望和劉賓雁的黨籍。由於他和海院關係密切，故他的出黨引

起了該海院的震撼，贊成與不贊成的分成兩派。

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一四九期的「百姓半日刊」裏曾刊出，劉受到特別嚴厲的管制。被禁止接見外國記者。更透露：一位美國作家要求見劉，中宣部下了一個批文，開了三個條件：（一）美國作家不能單獨見劉，必須作協書記處書記唐達成、鮑昌作陪；（二）話不宜多講，也不宜不講；（三）劉不要坐前排，也不要坐後排，要居中。劉不願意接受這幾個條件拒絕了。由於有關方面如此嚴密監視控制，他根本沒有會見外國客人的機會。

從以上的敘述，當可以了解「大陸知識份子」是如何的在度過這三十七年殘酷的現實生活。在這漫長的時間裏億萬中國人民的美好願望都已被破壞殆盡。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篇美麗的童話騙局而已，所謂「社會主義民主」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而已。連一向對中共奉為主子的左派文藝作家也不能避免遭整肅的命運，實為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不幸。

註釋

註1：中國事情專門雜誌「問題和研究」一九八八年一月號中共人物評傳（48）第17卷4號P.97。

註2：指山東省中部的沂山和南部的蒙山。

註3：齊辛著「風」一書，中國知識人，P.124。

註4：到終戰為止是為日本的國策通信社，亦即共同通信社的前身。

註5：齊辛著「風にそよぐ中國知識人」P.126。

註9：同註5，P.127。

註7：同註1，P.97。

註8：同註5，P.131。

註9：一九五六年四月「人民文學」。

註10：同註5，P.136～137。

註11：一九五六年六月、十月「人民文學」連載二次。

註12：一九五六年九月「人民文學」。

註13：一九五七年一月「文藝學習」雜誌

註14：『新民晚報』是當時很活躍的報紙。

註15：章靳以是哈爾濱出身的老作家，雜誌『收穫』的主筆。

註16：同註5，P.142。

註17：同註5，P.144。

註18：行政處分的一種，保留職務，在當局的保護監察下行動被限制。

註19：中國大陸的國家公務員原分爲三十級，最高是一級，十三級是省廳級，十三級以上叫做高級幹部，而現在最低級是爲二十六級。

註20：同註5，P.148～149。

註21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對全國所發出的通告。

註22：所謂『隔離審判』是由公安當局拘留並加以調查。

註23：所謂『階級隊伍的整頓』即從經歷、地位、思想傾向來判定其是否無產階級，在文革中很多的知識份子被戴上『反革命份子』

、『修正主義份子』的高帽子。

註24：所謂『無產階級獨裁』即對反革命份子加以彈壓。

註25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因毛澤東給林彪國防部長的信，而從一九六八年在各地所建造的幹部用學校，作爲經由『政治學習』和『肉體勞動』來揣摩精神面革命化的目的。

註26：這個時候的通敵者（叛徒）是指解放前，投降國民黨，做內應將黨的情報提供。

註27：『紅旗』一九六七年一月。

註28：『三信危機』即對社會主義的將來、共產黨的指導、四個近代化的實現不信任的，以青年階層爲中心的新思想的危機。

註29：指崇拜毛澤東個人及毛澤東時的極左思想所引起的反右派鬥爭、文革而言。

註30：一九七九年九月『人民文學』。

註31：中國之春月刊一九八六年四月總第34期P.23。

註32：九十年代月刊一九八五年十一月P.80。

註33：同註32，P.81。

管子今注今譯

李勉 注譯

二十五開本 二冊 一二九六頁

精裝每部九〇〇元 平裝八一〇元

管子一篇，共八十六篇（內十篇已佚名）運涵萬有，瑰本閱博，雖係法家經典，實蘊含百家之言，乃係龐雜之書而非一人一世之作，書中且多誤字、脫字、衍文、疏理爲難。李勉教授治此書有年，對於單字及詞語之艱澀者均詳加注釋，艱澀之字加以國語注音，地名必注今古，年份兼註西元，每篇正文後繫以題解及考評，題解者，解其題意及申論全文大旨，考評者，考此文之真偽得失及其他問題，註後則以白話翻譯全文，並特撰「管子其人及其書」，「管仲學術思想及其才智評估」二文弁諸卷首，以加深讀者瞭解。全書共九十三萬餘言，允推爲當今治管子學者之冠冕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
 電話：三一五五三八